

## 第一章 经济学的危机

经济危机一直是困扰现代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作为指导经济发展理论的经济学毋庸置疑也难辞危机之厄运。经济学的古典危机主要体现在价值悖论，经济学的现代危机则体现在数理分析缺乏原理性质的量纲单位。前者是定性危机，后者是定量危机，两大危机至今仍未解决。

### 第一节 价值悖论

自从 1776 年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一书以来，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由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学开始盛行和日益兴旺起来。斯密一方面继承了英国传统的对外贸易能增加国民财富和充填国库收入的经济思想，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合理地吸收了法国重农学派有关国民财富性质与原由的研究成果，使重商和重农两大学派思想达到有机结合，从而完成和确立了经济学独立学科的地位和发展方向。斯密以后经济学的发展是

围绕价值的性质和原由而展开的，即围绕价值内涵的定性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其结果形成两大价值体系：一大体系认为度量价值的尺度是劳动；另一大体系认为度量价值的尺度是效用。引发两大价值体系的原由是斯密对价值内涵悖论式的表述：“应当注意，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例如，水的用途最大，但我们不能以水购买任何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交换。反之，金钢钻虽几乎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须有大量其他货物才能与之交换。”（《国富论》第 25 页）他又说：“劳动虽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一切商品的价值，通常不是按劳动估定的，要确定两个不同的劳动量的比例，往往很困难。”（《国富论》第 27 页）这就是斯密所论述的价值悖论。正是斯密的价值悖论引发了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长达数世纪的大论战，使经济学成了近现代史上任何其他社会学科都无法比拟的且非常富有活力和新的思潮总是不断涌现的学科。二百余年来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们以破解价值悖论为崇高使命，而且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努力。人们孜孜不舍的奋斗精神使经济学大厦日趋完善，但可惜的是谁也没有把经济学皇冠上的这一耀眼的明珠摘下，即对经济学的价值内涵作出准确的、被历史和世人公认的定义。至李嘉图以来，许多杰出经济学家一经深入钻研破解此命题时，都深感这一

命题之深奥、内涵之丰富是尽毕生的功力也都难于陈述清晰的，都转而佩服斯密才华之超众，知识之渊博，判断之公正并非后人可以轻易超越的。当代西方声誉卓著的经济学教科书，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A·萨缪尔森编著的经济学教科书，虽然已改写十六版之多，领居半个世纪之久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显赫地位，但始终未能对价值正面作出概念内涵的定义。他仍然沿袭杰文斯的价格是数量函数的微分数理逻辑来附庸效用价值论体系。他的教科书是这样解释价值和价值悖论的：“正如一位学生所说的那样，经济学的价值论并不难懂，只要你记住：在经济学中，是狗尾巴摇动狗身子。摇动价格和数量这个狗身子的是边际效用这条狗尾巴。我们可以用下面的说明来解决价值悖论：商品的数量越多，它的最后一单位的相对购买愿望越小。因此，为什么大量的水具有低微的价格，为什么必不可少的物品，如空气，成为免费物品，其答案就清楚了。在这两种情况下，正是巨额的量使其边际效用大大减少，因而降低了这些重要物品的价格。”（《经济学》十四版第 167 页）不过我在这里倒要请教萨缪尔森教授，何谓最后一单位空气？是人老死瞑目时的那一单位？还是由意外或将窒息时的那一单位？如果是前者最后一单位空气效用的确是无价值的，如果是后者那么其价值则是无量的，它的价值或许可以拯救一个人生命。当然，我们这样提出诘难，无非是说空气对人们日常生存并不存在最后一单位的边际效用逻辑，还有房屋、彩电等等商品的效用都不存在最后一单位的边际效用逻辑。可见最后一单位逻辑的所谓边际效用价值是根本

站不住脚的。至以巨额数量说法可适用诠释各种价值论学说，同样也可适用劳动价值论的分析，正是巨额量使人们所费劳动大大减少，因而降低了这重要物品的价格，如居住江河之傍的人们，水几乎不要耗费劳动就可以满足生活之无限需求，所以大量水的价格低微。空气是不需要任何人的劳动且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分分秒秒满足无限需求之物质，所以空气不存在价格问题。就是说仅用数量逻辑可以作各种价值内涵的诠释，还可以诠释边际替代价值论、偏好价值论等等。正如有的经济学家所说：数学是台磨，你放进小麦磨出面粉，你放进大豆磨出豆粉。因此数理逻辑并不能代替各个学科的性质原理。学科的灵魂不在于数理逻辑，而在于学科自身的因果原理。

## 第二节 数理分析的量纲危机

为什么说西方经济学的数理分析可作各种价值内涵的诠释呢？这里问题出在价值的定量分析没有经济学原理所赋予的量度单位。因此这种数量分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放之各学科而皆灵的数论分析，但决不是学科原理内涵的数量分析。就是说经济学家们把数理逻辑推演为经济学原理了，数学变成经济学的主人，而不是仆人和工具。俄国学者伊·戈·布留明所著《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一书对数理学派批判是中肯的，他准确引用西方对此有深刻见解的

经济学家们的认识：“熊彼特在上面引过的文章中：‘数学无非是一种方法，它不能提出任何新的、不知道的东西，因而也不能提出任何错误的东西，但是能正确地完成形式的任务，如果它一般地可以适用的话。’维克塞尔在自己的书中说：‘数学的叙述方法应当只是有助于推理，把结果明显地表达出来，从而有助于避免可能的逻辑错误，别的作用就没有了。它不可能做出任何更多的东西来。’‘从数学分析的熔炉里只能取得已经投入其中的那些原理。’费雪从数学家皮尔斯的《线性结合代数》一书中引了他的一段话：‘数学不发现规律，因为它不是归纳的科学，它也不创造理论，因为它不是假说，但是数学是规律和理论的法官。’费雪接着说：‘我引这段话是因为我认为，许多人特别是经济学家，没有弄清楚数学的一般性质。有一种看法，认为物理学家坐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借助计算，像是使用某种法宝，能够臆造出任何物理学规律。某些经济学家就希望也这样神秘地把数学应用于自己的科学中。’（《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下卷第 51 页）

经济学引进数理分析方法的发展趋势是可喜可贺的，因为一门与数量紧密联系的知识体系，若不能用数学方式来表述，那它还不能算是科学的体系。众所周知，若采用演绎和归纳的方法论述则可无需量纲单位，如古典经济学家们正是采用演绎和归纳的方法探讨经济学原理，所以他们无须量纲单位。但一经引入数理分析方法，则必须首先给出本学科原理内涵的量子单位，比如物理力学把质量定义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就是说在给定量纲单位情况下，力与

速度的变化率之比为恒量。这是牛顿所揭示的力学基本原理。力与速度变化率的恒定比值，称为该物体的质量  $m$ 。于是

$$m = \frac{F}{dr/dt} = \frac{F}{a}$$

这就是牛顿力学的质量内涵。在这个内涵基础上给出量纲单位 如 当作用力为 20 磅时 物体的加速度为 5 英尺·秒<sup>-2</sup>，则该物体的质量为：

$$m = \frac{20 \text{ Ib}}{5 \text{ ft} \cdot \text{s}^{-2}} = 4 \text{ Ib} \cdot \text{ft}^{-1} \cdot \text{s}^2$$

就是说为使该物体有每英尺·秒<sup>-2</sup>的单位加速度，就必须对它施加 4 磅的力。这样物体质量就有了力学原理内涵的可度量的真实值，而且根本不存在同义反复的逻辑错误。再

比如方程  $x = r_0 t + \frac{1}{2} a t^2$ ，如果不给出任何学科量纲单位，这个方程就不可能有确切内涵学科解，这就是一个纯数学代数方程。如果给出了力学量纲单位，这个方程就有了确切力学内涵的解。 $x$  若以米为量度单位， $r_0 t$  和  $\frac{1}{2} a t^2$  两项也必须用米来表示，假定  $t$  以秒为单位 那么  $r_0$  的单位一定为米·秒<sup>-1</sup>， $a$  的单位必为米·秒<sup>-2</sup> 系数  $\frac{1}{2}$  是纯数，无单位。

设  $r_0 = 10 \text{ m} \cdot \text{s}^{-1}$ ， $a = 4 \text{ m} \cdot \text{s}^{-2}$ ， $t = 10 \text{ s}$ ，则上式可以写为：

$$x = (10 \text{ m} \cdot \text{s}^{-1})(10 \text{ s}) + \frac{1}{2}(4 \text{ m} \cdot \text{s}^{-2})(10 \text{ s})^2$$

这些单位可以像代数符号那样处理，在第一项秒<sup>-1</sup>与秒相

消，第二项中秒<sup>-2</sup>与秒<sup>2</sup>相消，所以： $x = 100m + 200m = 300m$ ，就是说这是一个求加速度行程的距离方程，可见其力学内涵通过量纲单位给出就准确体现出来了。而且单位还是检验所设方程是否正确的逻辑法官，就是说所设方程数理逻辑能相消什么单位，保留什么单位，所保留的单位就是该函数方程所求的内涵值。如果保留的单位不是学科所要求的内涵值，那么该函数方程就没有意义了。而量纲单位又是从本学科基本原理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学科基本原理的最基本、最简洁的数理表达式，因此单位是检验所设函数方程是否符合学科因果前提的逻辑法官。没有单位，所设函数方程是否正确就失去了检验的标准。如果上述方程，不给出力学量纲单位，则：

$$x = (10 \times 10) + (4 \times 10 \times 10) = 300$$

这就变成纯代数运算，力学加速度原理不见了，学科的本质内涵没有了。那么 300 究竟是什么意义呢？是指路程呢？还是指时间呢？若是指路程，究竟是 300 米 还是 300 公里呢？这一切都无法确定了。所以数理分析的前提是设立学科原理的量纲单位，把学科的基本原理量化成单位，以便找出学科变量要素之间的函数联系，这就是数理分析的科学要旨。

西方经济学数理分析因缺乏本学科原理内涵的量度单位，因而数理分析不可避免出现两大致命弊病，一是同义反复，用价值证明价值；二是所求解没有确切内涵，可作各种价值内涵诠释，既可作基数效用解释也可作序数效用解释，同样还可作劳动价值论解释等等。就是说西方经济学教科

书的主要数理分析工具，即价格与数量坐标轴内的那根向右下倾斜曲线，几乎成了经济学分析的万能曲线。似乎经济学任何内涵都能由它加以说明，但从来也没有任何人用它解决过实际的价格问题，是中看不中用的无实际运用价值的一条曲线。这就是今日经济学数理分析的危机。这种危机若不再引起经济学家们的醒悟，经济学会被无量度单位的所谓数理分析引入到伪科学的深渊。牛顿力学是幸运的，因为牛顿在没有发现微积分以前就先发现了力学原理。微积分只是力学原理的数学解析工具，所以牛顿力学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西方数理经济学是不幸的，它的不幸在于微积分比它早问世数百年，所以只好做微积分的孙子和仆人，由此也就产生了“许多人特别是经济学家，没有弄清楚数学的一般性质，有一种看法，认为物理学家坐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借助计算，像是使用某种法宝，能够臆造出任何物理学规律，某些经济学家就希望这样神秘地把数学应用于自己的科学中”的奇特现象。

以科学眼光觉察经济学数理分析缺乏合用量纲单位的是现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中说：“在写本书时有三点疑难最妨碍我工作之进行，在我没有设法解决以前，我总不能把我自己的意见畅达表示出来。这三点疑难是：第一，如何选择几个单位，在处理有关整个经济体系之许多问题时可以合用第二如何确定预期在经济分析中之地位第三如何规定所得之定义。”（《通论》第 35 页）不难发现，凯恩斯是富有极高洞察力和创造力的经济学家，《通论》的理论水

准与《货币论》比较发生了质的升华。《货币论》的数理分析思路是指数分析，指数法显然不能表达经济学基本原理，正如凯恩斯在《通论》中所说：“众所周知，一般物价水准这一个概念，含义空泛，而且亦无法使其精确，故不适用因果分析——后者应当是精确的。”（《通论》第 37 页）所以《货币论》曾被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尔斥责为“盎格鲁撒克逊类型的不必要的标新立异”。而对《通论》发表米尔达尔则不敢小视了。《通论》之所以能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产生革命性影响就在于他成功地设立“所得”与“就业”的量度单位，他提出量度单位的设立原则是“在处理有关整个经济体系之许多问题时可以合用”是一个科学的原则。正如物理力学、热学、电学的量纲单位在整个力学、热学、电学体系内都可以通用一样。正是基于这个科学的原则，凯恩斯指出了英国剑桥学派所用单位之缺陷：“经济学家通常所用单位之不能令人满意，可以用（一）国民所得，（二）真实资本之数量，以及（三）一般物价水准，这三个概念为例说明之：

“（一）国民所得，依照马歇尔及皮古教授所下定义，乃衡量本期产量或真实所得，而非衡量本期产量之价值或货币所得。而且，国民所得是一个净概念，必须从本期产品中，减去本期开始时已有的资本设备在本期中所蒙受的耗损，二者之差才是国民所得，才是社会资源之净增量，可以用之于消费，或留之为资本。经济学家想从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一个量的科学。不过，假设这个定义以此为目的，则我们有一严重非难：即社会所产物品与劳役乃一不齐性的复杂体，除非在若干特例下，严格说来，是不能衡量的。特例

之一 例如所有产品都以同一比例增加。(《通论》第 36 页)

这反映出凯恩斯已经清楚意识到产品数量单位不能作为经济学分析之合用单位“即社会所产物品与劳役乃一不斉性的复杂体”。合用量度单位应从产品价值形态去寻找。什么是产品的价值呢？产品价值单位的内涵是什么？他采用的是货币表证的劳力工资单位，无疑这一单位采用比效用价值论的“尤特尔”(utility)单位要更接近真理，或者说要更优胜一万倍。它的优胜在于用就业量和时间量为商品价值单位的构成要素，这无疑是一个可测度和可操作的共性要素单位，这就抓住了商品价值的本质和核心。他是这样设置单位的：“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斉性的，后者则可以变为斉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之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所得报酬之大小加权。例如：设一小时特种劳工之报酬，为一小时普通劳工之两倍，则一小时特种劳工，即以两单位计。衡量就业量之单位，我们称之为劳力单位；一劳力单位所得之货币工资，称之为工资单位。故设  $E$  为工资及薪金支出， $W$  为工资单位， $N$  为就业量，则  $E = N \cdot W$ 。”(《通论》第 38 页)不难发现这一价值单位数理认识思路源泉于斯密有关原始状态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斯密说：“在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例

如，一般说，狩猎民族捕获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么，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所以，一般地说，二日劳动的生产物的价值二倍于一日劳动的生产物，两点钟劳动的生产物的价值二倍于一点钟劳动的生产物，这是很自然的。

“如果一种劳动比另一种劳动更为艰苦，对于这较大的艰苦，自然要加以考虑。一点钟艰苦程度较高的劳动的生产物，往往可交换两点钟艰苦程度较低的劳动的生产物。”  
(《国富论》第 42 页)

然而凯恩斯在斯密这一原始劳动价值量思路，用现代工资单位改进处理后而推出的价值单位，并不是“在处理有关整个经济体系之许多问题时可以合用”的单位，工资单位仅是从宏观上，从国民收入总量上解决社会总产品之价值问题。但它并没有解决具体商品的价值问题，即这一商品与另一商品的价值量比较问题。就是说从宏观领域，从全社会总体上看这一价值单位是成立的，但从微观领域这一价值单位就不成立了。也就是说在具体商品交换中不能承认使用劳动力越多，工资越高的企业商品其价值量越大，因此可交换他种商品量越多。显然这和今天高度发达市场商品交换的事实相悖。就是说凯恩斯的价值单位不可能成为具体商品交换的价值单位。

正如西方经济学家们所批评的，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体系和微观经济学脱节了。这样西方主流经济学变成了两张皮，一张皮是建立在马歇尔综合的价格与数量之几何分析基础的微观经济学；一张皮是建立在“所得 = 产品价值 = 消

费 + 投资”理论上的宏观经济学。所以要解决经济学的两张皮问题，必须重新探讨设立“在处理有关整个经济体系之许多问题时可以合用”的新的量度单位。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危机我们通过最近萨缪尔森为其《中间道路经济学》的中译本所作序言可以发现当他步入老年后对经济学的忧虑，他说：“现代主流政治经济学在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取得了许多进展，对此完全有理由引以自豪。但是，经济学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它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而且，依我之见，我们并未处于这样一种进步过程，这就是要走向物理的和实验的生物分子科学的精密性。这么说不是谦虚，而是一种多少有点傲慢的声明，因为正是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读者，才最清楚地知道，经济学的最大疑难是什么，在哪方面出现错误的可能性最小。”

我们可以预言：当人类进入 21 世纪时，经济学必将掀起一场以解决价值定性和定量分析为内涵的新革命，这场革命理所当然地落在中国经济学家们的肩上，因为中国站当代经济改革开放的前沿且又有 20 年成功的实践加上近半个世纪以来努力探索东西方各经济学派理论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学术上融贯东西且又有数千年经济文明沃土作根本，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张旭博士所说：“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对过去建设中弊端的认识，讨论的视角更新了、范围拓宽了，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学术氛围，经济学人才也从几乎清一色的马克思经济学变成了复合结构的，既有马克思经济学功底扎实的学者，

也有留洋归来掌握最新现代经济学发展前沿的学者，更有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于一身的全面人才。在这种全新的人才储备和学术氛围下，中国的经济学创新具有了组织和人员以及外部环境的准备，因此不仅具有现实对经济学创新要求的合理性，也具有了其建立的可行性。”<sup>①</sup> 所以中国经济学派必将在世界的东方崛起，这是必然的、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

<sup>①</sup> 张旭：《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版，第 23 页。该书为林毅夫主编的《中国经济前沿问题丛书》的一种。



## 第二章 价值渊源、流派和思路的分析

时至今日，各种价值分析之原由都可以从斯密的《国富论》找到其渊源，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斯密成功地提出了价值悖论。价值悖论的成功提出，说明斯密是一位具有严谨逻辑思维的学者。透过这一悖论，我们不难发现，斯密最初考察商品的交换价值可能是从商品效用思路出发的，因为任何物品只有具有某种效用，才具备可交换的前提或价值。然而，当他一经深入此思路时，他发现空气和水这种对人具有极大效用物不具有可交换价值时，于是有了价值悖论的思考。

斯密为什么要提出悖论式价值理论呢？难道斯密缺乏对其诘难学者那种判断水准，没有觉察这是资源稀缺或巨额量的缘故？不知道空气和水的巨额量使它们缺乏交换价值吗？恰恰相反，正是他非常了解这一点，他深知空气和水的巨额量使任何人都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都可以自由地享用，所以斯密才认为：“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对已得此物但愿用于以交换他物的人来说，它的真正价值，等于因占有它而能够自己省免并转加到别人身上去的辛苦

和麻烦。以货币或货物购买物品，就是用劳动购买，正如我们用自己的劳动取得一样。此等货币或货物，使我们能够免除相当的劳动。它们含有一定劳动量的价值，我们用以交换其他当时被认为有同量劳动价值的物品。劳动是第一性价格 是最初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国富论》第 26 页) 斯密这一代价内涵的价值认识思路在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他不仅抓住了商品交换的本质关系，而且也抓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本质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1 页)

遗憾的是，这样一条伟大的真理，被今天的经济学家们视为陈词滥调，他们忘记了这是指引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伟大航灯。李嘉图和马克思在经济学领域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其发展了斯密的这一劳动价值论。虽然斯密“辛苦”和“麻烦”的价值说法并不完善和圆满，以至引来后人的诘难。但它强调价值是一种物物交换的代价，价值的真实内涵是“等于因为占有它而自己省免并转加到别人身上去的辛苦和麻烦”的思想，其内涵十分丰富，不仅包含了经济的交换分配，而且还包含了社会的、政治的分配制度内涵。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在财富占有和分配之间的社会关系。效用反映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商品交换其本质无疑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只有劳动价值论才能体现这种人与人之

间价值关系。以至后来李嘉图等经济学家以政治经济学内涵来继承和发展其学说，李嘉图曾说：“经济学只研究社会各阶级通力合作所产生的产物，依何种法则，分配于各阶级。关于数量，实在并无法则可言，但关于分配比例，倒可以找出一个相当的法则。我越来越觉得，追求前者是劳而无功的，后者才是经济科学之真正对象。”（《通论》第 8 页附注）

毋庸置疑，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思想是斯密、李嘉图脉络体系的必然延伸和发展。马克思说：“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量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资本论》第一卷第 50 和 53 页）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这一数理分析是迄今为止最具有真理内涵的科学分析，可以说迄今为止有关商品价值的数理分析还没人达到这一真实科学水准。当然，马克思的这一数理分析不是最终真理，经济学也不存在最终真理，恰恰相反，马克思的这一数理分析为他的后继门生们提出了一个艰难的课题，即这一数理分析若要用数学语言表达，首先必须解决劳动的量和生产力的量度单位。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经济学才能卓有成效地运用数学方法，这才是真正地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继承和发展。